



北大哲学门经典文萃

主编 陈 来

贺 麟 选集

HELINXUANJI

张学智 / 编



中国哲学的阐释
西方哲学的透视
哲学体系的创建
20世纪中国哲学大师
20世纪中国哲学经典之作
20世纪中国哲学成就标志

吉林人民出版社

贺麟选集

张学智 / 编

吉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大哲学门经典文萃.贺麟选集/陈来主编,贺麟著.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5

ISBN 7-206-04676-2

I.北… II.①陈… ②贺… III.贺麟(1902~1991)—哲学思想

IV.B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43368 号

贺麟选集

著 者:贺 麟

编 者:张学智

策划编辑:徐家康

责任编辑:崔 凯

封面设计:沈 赫

责任校对:王晓红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中国·长春市人民大街 7548 号 邮政编码:130022)

网 址:www.jlph.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431-5395846

印 刷:长春市永恒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20mm×970mm 1/16

印 张:33.25 字 数:540 千字

标准书号:ISBN 7-206-04676-2

版 次:2005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3 000 册

定 价:42.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总 序

在 20 世纪中国文化史上，北京大学占有一个特殊的地位。北京大学是中国近代建立的第一所国立综合大学，自新文化运动初期以后，更成为全国思想文化和学术教育的中心，在 20 世纪中国社会文化变迁的过程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

1898 年京师大学堂建立以后，本设有经学、诸子学、理学等传统哲学课程，但未立“哲学”之名。1912 年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北京大学，学科设置改革，乃明确建立文科“哲学门”，至 1919 年，哲学门改称“哲学系”。北京大学哲学系是中国近代大学所建立的第一个哲学系，自北大哲学门 1914 年正式招生，至 2004 年，北大哲学系的建系历史已经走过整整 90 年。

20 世纪中国的哲学教育与哲学研究的发展，和北京大学哲学系结下了不解之缘。自北大哲学门建立以来，蔡元培、胡适、蒋梦麟、梁漱溟、熊十力、汤用彤、冯友兰、金岳霖、唐钺、邓以蛰、宗白华、朱光潜、冯定、陈康、贺麟、洪谦、朱谦之、张岱年等著名学者都曾在北大哲学系任教。可以说，20 世纪中国著名的哲学家，绝大多数都与北京大学哲学系有关，而他们当之无愧地是 20 世纪中国哲学界所拥有的自己的大师。这些大师中的任何一位，若在全国其他大学的哲学系，都可以成为这一大学足以为傲的光环；而北京大学哲学系曾拥有如此众多的大师，也就使北大哲学系拥有了其他大学难以相比的得天独厚的资源。正是这些大师们，使得 20 世纪的北京大学哲学系对 20 世纪的中国哲学发展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北大哲学系 90 年的发展史即是 20 世纪中国哲学的发展史的缩影。

北大哲学系的这种地位也是历史地形成的。民国初年从北京大学发起的新文化运动使得它成为全国思想文化的中心；抗战期间，北大与清华、南开合为西南联合大学，成为全国高等教育的中心；1952 年院系调整，把当时全国大学的哲学系都集中在北京大学，成为全国大学唯一的哲学系。1956 年以后，北大哲学系不断调出教师，或接受进修，积

极参与了各地大学哲学系或哲学专业的重建或新建，以及哲学研究所的成立，而且在相当一个时期里，北大哲学系的毕业生成了全国各大学哲学系教师队伍和哲学专业人员的重要培养来源。这一切使得这些哲学教育与学术的单位，在哲学教育和学术研究上，不同程度地以北大哲学系为楷模，受到北大哲学系的深刻影响。

另一方面，在上述历史变化的过程中，北大哲学系由于不断吸收清华大学哲学系和来自全国其他哲学系的营养，丰富和壮大了自己的发展，培养起了哲学学科兼容并包、多元发展的风气和心态。在研究方法上，早在20世纪30年代，北大哲学系在胡适、汤用彤的影响下，形成了重视哲学史研究的风气和传统，而清华大学哲学系在20世纪30—40年代的发展中，以冯友兰、金岳霖为代表，渐渐形成了重视逻辑分析方法的哲学传统。在哲学体系上，北大的熊十力、梁漱溟、贺麟的哲学思想都与中国传统的“心学”关系密切，而清华的冯友兰、金岳霖的哲学思想都与中国传统的“理学”接近。经过西南联大的合作和院系调整的合并，20世纪50年代之后的北大哲学系，融合了不同的学术追求，兼重思想资料和哲学分析，在哲学思想和学术研究上，基础更加宽厚，力量更加充实，研究更为多样。当然，今天北大哲学系的传统，不仅仅是融合了来自其他大学的传统和优长，其自身也历经了种种的发展。如1949年以后，与全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一样，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学者经历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洗礼，在理论素养和研究品质上有了进一步提高，从而，不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研究和理解，结合着中国社会主义的实践历程，获得了以前不可能有的成绩，在各个学科方向上也丰富了自身研究的传统。

20世纪中国哲学的发展与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密切联系，除了北京大学在中国近代历史中形成的地位、中国社会文化的现代变迁、中国与世界文化的不断融合等历史的和外在的因素之外，也揭示出现代哲学的发展与大学建制的牢固结缘。从世界历史来看，近代社会与制度变迁给哲学带来的最大影响是，哲学的主要舞台转移到近代意义上的大学，转到以大学为主的现代教育、科研体制中来，这使得以学科为中心的知识性的哲学研究和哲学教育大为发展。事实上，康德以来的西方哲学家无不以大学为其讲学著述的依托。所以，尽管20世纪的中国哲学家中仍有不满于学院体制或倾向于游离学院体制之外的人，但绝大多数哲学家

和研究哲学的学者都不可能与大学绝缘，因为大学已经成为现代社会提供哲学基础教育和哲学理论研究环境的基本体制。哲学与大学的这种密切关联，是几千年来中国历史上所没有的。其结果是，哲学作为大学分科之一在近代教育体制中获得一席稳固的地位，而哲学家也成为专业化的哲学教授。上面提到的 20 世纪中国哲学家，他们的哲学研究工作，和他们的哲学体系的建立，也大都在大学之中。即使是最倾向于学院外体制的梁漱溟和熊十力，他们的名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和《新唯识论》也都是任教北大哲学系时期完成的。哲学与大学的这种关系，从一个方面标志了传统哲学与现代哲学的时代的分野，同时也不能不对哲学发展的本身造成影响。

本系列收入了十位 20 世纪曾在北大哲学系任教的中国哲学家的研究著作，即胡适、熊十力、梁漱溟、汤用彤、冯友兰、金岳霖、朱谦之、贺麟、洪谦、张岱年。这些哲学家的著述，如果参照 50 多年前贺麟所总结的中国哲学研究的格局，在内容主体上可分为三类，即中国哲学的阐述，西方哲学的介绍和哲学体系的创立。这十位哲学家大都建有自己的哲学体系，有些虽未建立明确的哲学系统，但其对哲学史的研究亦体现了他们的哲学态度和哲学立场。无论如何，这些哲学家的著述，或具有对中国哲学的精湛研究，或具有对外国哲学的透彻了解，或建立起自己特色鲜明的哲学体系，都在哲学上达到了很高的成就，堪称为 20 世纪中国哲学的经典之作。这些现代中国哲学的经典之作，无论是哲学史的研究，还是哲学体系的建立，在 20 世纪世界哲学的相应领域中都达到了一流的水平。回顾这些 20 世纪哲学经典之成就的取得，有两点十分突出：第一，现代中国哲学的哲学研究，无不以西方哲学及其发展历史为参照的背景。从欧美留学归国的学者自不必说，即使最具传统特色的学者如梁漱溟、熊十力，他们的哲学问题意识也都受到西方哲学观念的深刻影响。西方哲学是人类智慧中理性分析和建构的精致代表，西方哲学的形态虽属特殊，但其中不少问题的讨论是具有普遍性的。西方哲学的论述虽然不是哲学所以为哲学的根本规定，但西方哲学已经成为现代哲学学科的基础，学习西方哲学可以为研究其他哲学提供具有普遍意义的重要方法。而深入了解西方哲学和世界其他哲学，将促使我们更深入地了解自己的哲学传统。第二，现代中国的哲学体系的创制必须与中国传统哲学的资源建立积极的关连。正如陈寅恪所说，“窃

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果亦当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两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熊十力的新易学、梁漱溟的新儒学、冯友兰的新理学、贺麟的新心学、金岳霖的新实在论、张岱年的新唯物论，都在不同的程度上自觉地与中国古典哲学相接应，与中国文化传统的实际相结合，20 世纪在构建哲学体系上卓有成就的中国哲学家皆是如此。

本系列的编辑，缘起于吉林人民出版社的策划，而委托我来加以组织。今年 2004 年是北大哲学门成立 90 周年，精选北大哲学系的著名哲学家的重要作品并编辑为系列，不仅可以作为对北大哲学门 90 周年的纪念，也是对 20 世纪中国哲学成就的总结展示，对 21 世纪中国哲学的进一步发展亦可提供十分有益的借鉴，应当说是很有意义的。我接受这一工作后，根据出版社先编辑中西哲学部分的意见，即选定十位已故的曾任教北大哲学系的哲学家，邀请了专门研究这些哲学家的专家参与合作。他们是：胡军教授、李存山教授、张学智教授、景海峰教授、欧阳哲生教授、孙尚扬教授、黄夏年教授、韩林合教授等。他们对所编的哲学家及其著作，素有专深的研究，他们欣然接受我的邀请，放下手中的研究工作，共同努力，使得“北大哲学门经典系列”在不太长的时间里编辑完成了。对他们的大力协助和有效工作，我谨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系列的编选尽量以突出其哲学思想为主，名著和名篇并重。编选力图与已有选集有所不同，体现出编者独到的选读眼光和安排构思，从而使得本系列在突显这些学者对 20 世纪中国哲学创作与研究贡献的同时，亦以提供本系列编者的独到解读为特色。

本系列的编辑还得到了北京大学“十五”“211”工程计划的支持，也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陈 来

2004 年 12 月 20 日

前言

(一)

贺麟(1902—1992)字自昭,中国现代著名哲学家,西方哲学史家,翻译家,当代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四川金堂县人,父亲为前清秀才,精于宋明理学,曾主持县里的教育事务。贺麟6岁入私塾,15岁入成都石室中学,19岁入清华学校。在清华,他选习了梁启超的“国学小史”、“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王阳明哲学”等课程,并在梁启超的指导下,发表了《戴东原研究指南》、《博大精深的焦理堂》等文章。还选习了吴宓的翻译课,在吴宓的鼓励下译了一些英文诗和散文,并对照原文阅读严复的译作,发表了《论严复的翻译》。从此时起他就决心以介绍和传播西方古典哲学为自己终身的志业。

1926年,贺麟于清华学校毕业,同年8月,赴美国中部奥柏林大学留学。这所学校占统治地位的是杜威的实用主义和经验论,注重从心理学、人类学去研究道德问题。贺麟在这里遇到了把他引入黑格尔和斯宾诺莎哲学之门的耶顿夫人(Mrs. Yeaton)。贺麟晚年曾回忆说:“由于她的启发,奠定了我后来研究黑格尔和斯宾诺莎哲学的方向和基础。所以她是我永生难忘、终生受益的老师。”^①在耶顿夫人的指导下,贺麟读了一些研究人类史前文化的著作,写了关于神话、村社制度、魔术、原始婚姻形式的论文,对文明社会的伦理观念在历史上的发展变迁问题很有兴趣。

1928年3月,贺麟在奥柏林大学取得学士学位后,去芝加哥大学。在芝加哥大学,他听了“精神现象学”、“柏格森哲学”、“格林、西季微克、摩尔的伦理学”等课程,特别感兴趣的是格林的学说。格林是德国古典哲学在英国的先驱,批评英国传统的经验主义,欲为伦理学提供形而上学的基础,并要调解宗教和理性、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对立。对格林的研究和喜好标志着贺麟从经验论到理想论的转变,并对以

^① 《哲学与哲学史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2页。

后吸收鲁一士的思想以及到德国专攻黑格尔哲学有决定性的影响。

1928年9月，贺麟离开芝加哥大学，到哈佛大学留学。在哈佛，他听过霍金（M. E. Hocking）的“形而上学”和怀特海的“自然哲学”课，并在课外读了许多美国新黑格尔主义哲学家鲁一士（J. Royce）的著作，如《基督教问题》、《哲学的宗教方面》、《忠的哲学》、《近代哲学的精神》、《近代唯心主义演讲》等，特别后二书对贺麟影响极大，贺麟曾将其中最精要的部分译成中文，名《黑格尔学述》，1936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他也读了不少威廉·詹姆士的著作，如《信仰的意志》、《宗教经验的类别》、《彻底经验主义》等，对詹姆士强调感情，强调性情、信仰这个方面印象最深。但他同时认为，感情和信仰是盲目的，应该接受理智的指导。感情虽然是当下的、有力的，但它是短暂的，因此不能完全依赖感情。这是贺麟用得自斯宾诺莎的理性来调和詹姆士的性情，同时批评詹姆士的哲学擅长心理学方法，但缺少历史方法。

贺麟在哈佛还写了《道德价值与美学价值》、《论自然的目的论》等重要文章。前一篇文章是在听了怀特海的自然哲学课之后所写的论文，意在介绍怀特海把道德价值转化为美学价值，把美学价值转化为自然价值的趋向。他认为在这种解释中“罪的观念已经抛弃了，对恶的狂热的和迷信的态度已经被把握住它的科学的、美学的态度所取代。”^①后一篇文章认为对自然物的把握可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从先验原则出发，认为自然事物具有内在的目的；另一个方面是从机械论的因果关系出发，认为自然事物无目的性。前者是思辨哲学所取的途径，后者是自然科学所取的途径，两者可以并行不悖。

鲁一士对贺麟的影响主要在三个方面：一、世界是绝对精神的意义和目的的表达，精神是本体，世界是表现。二、精神本体是能动的，绝对精神是个“战将”，它克服了前行道路上的一切障碍，最后回归自己，而这个回归是获得世界历史的全部丰富性于自身。三、所谓上帝是“天者理也”、“天理自在人心”那样的上帝，宗教的基础是哲学。这些思想都对贺麟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同时也促使他萌生了到康德、黑格尔的故乡去学真正的康德、黑格尔哲学的愿望。

1930年10月，贺麟谢绝了哈佛研究院的挽留，前往德国。在柏林

^① 《哲学与哲学史论文集》，第71页。

大学，他先学习德语，然后听黑格尔哲学的课程，阅读黑格尔研究方面的德文著作。其中哈特曼的《黑格尔》、格洛克纳的《黑格尔哲学的渊源》、狄尔泰的《青年黑格尔的历史》几种书，对他产生了较大影响，他说：“我之所以喜欢这几种谈黑格尔哲学的书，即因为这几种书既不抽象附会，又不呆板乏味，而著者又皆是能负荷黑氏哲学，有独立思想，在哲学史上占相当地位的哲学家。而且他们皆将全部哲学史烂熟胸中，明了黑格尔的时代、背景、个性，将其全部思想融会于心，而能以批评的眼光、自己的辞句、流畅的文字表达出来。我相信这样的著作不仅可以引导我们认识黑格尔，而且可以引导我们认识什么是真正的哲学。”^① 在德国，贺麟读了一些关于黑格尔的研究著作之后，感到要真正把握黑格尔哲学，非要先深入研究斯宾诺莎和康德不可。于是在研读黑格尔的同时，也潜心于斯宾诺莎和康德哲学的研究，并且着手翻译斯宾诺莎的重要著作《伦理学》。他还结识了国际知名的斯宾诺莎专家、德文及拉丁文《斯宾诺莎全集》的编集者犹太人格布哈特（C. Gebhardt）。格布哈特邀请贺麟到他家里做客，并且介绍贺麟加入国际斯宾诺莎学会。但不久格布哈特死于纳粹的迫害，学会停止了活动，贺麟的斯宾诺莎译述也告中断。由于继续在德国留学尚须得到清华学校的批准，贺麟于1931年8月动身回国。

（二）

回国后，由数学家杨武之推荐，贺麟受聘于北京大学，讲授西方哲学史、现代西方哲学、黑格尔哲学课程。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举国震动。贺麟接受了时任《大公报》文学副刊编者吴宓的建议，写了《德国三大哲人处国难时的态度》，以拿破仑入侵德国时，康德、费希特、黑格尔何以自处的事迹警策国人。文章分七篇连载。对于歌德，贺麟着重介绍他“谋国以忠”、“临难毋苟免”的态度和使抽象的真理具体化，使严肃的道德艺术化的人格特征。对于黑格尔，着重介绍五个方面：一、诗教，使人有美的陶养；二、礼教或宗教，使人有道德的陶养；三、理学和心学，使人有征服一切不合理的事物的信念；四、科学知识，特别是历史感，使人明了民族精神和立国根本；五、矛盾法，使

^① 《黑格尔》译序。

人从中得到殊途同归、相反相成、“死以求生”的信心、希望和拼命精神。对费希特，着重介绍其惊世骇俗的戏剧式人格、知行合一的知识学，及在普法战争中冒死作《告德意志国民》演讲，为德意志民族复兴奠定精神基础的事迹。此书是贺麟学术报国志愿的具体实践，刊出后各界反应良好，在当时发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从1931年回国后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是贺麟学术思想的勃发期。1934年3月，贺麟发表《近代唯心论简释》一文，此文是贺麟哲学思想的宣言，此后的许多文章，都是此文所阐述的基本思想的扩充与引申。文中说：“心有二义：一、心理意义的心；二，逻辑意义的心。逻辑的心即理，所谓‘心即理’也。心理的心是物，如心理经验中的感觉幻想梦吃思虑营为，以及喜怒哀乐爱恶欲之情皆是物，皆是可以几何方法当做点、线、面一样去研究的实物。普通人所谓‘物’，在唯心论者看来，其色相皆是意识所渲染而成，其意义、条理与价值，皆出于认识的或评价的主体。此主体即心。一物之色相、意义、价值之所以有其客观性，即由于此认识的或评价的主体有其客观的必然的普遍的认识范畴或评价准则。若用中国旧话来说，即由于‘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离心而言物，则此物实一无色相、无意义、无条理、无价值之黑漆一团，亦即无物。”^①此文中心理意义的心，指见克莱、休谟所讲的感觉经验。这个意义的心是能实证地当做客观对象来研究的。逻辑意义的心取自康德，此心乃经验的统摄者，行为的主宰者，知识的组织者，价值的评判者。贺麟新心学最看重的就是此逻辑意义的心。所以他认为，心学说到底即注重心与理一，心负荷真理，理自觉于心的哲学。这篇文章虽篇幅不大，但综合了贺麟的黑格尔学、斯宾诺莎学、康德学及对宋明理学的理解，明白宣示出他的哲学主张，可以视为他的哲学宣言。所以在1942年编集自己的第一本论文集时，贺麟即以此文为文集的首篇，并以此篇之名为文集的书名。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北平、天津沦陷。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奉教育部之命迁往长沙，组成临时大学。次年又迁至昆明，改为西南联合大学。贺麟随文学院迁至蒙自。八年抗战，是贺麟生命最为昂扬，思想最为活跃，因而也收获最为丰厚的时期。这一时期，贺麟写了大量论文，收入《近代唯心论简释》和《文化与人生》中。

^① 《哲学与哲学史论文集》，第131页。

这些文章大都本于他以上宣示的心学基本主张，而与抗战期间高度发扬精神的力量，挖掘民族文化的宝藏，哲学上弃旧图新的时代要求相呼应。此时的文章大多思想创颖活泼，有丰富的内容和充沛的活力，如《时空与超时空》，发挥康德学说讨论时空问题，认为“时空者理也”，时空是经验事物所以可能之理，此理本具于心中。时间与空间不是死的标准或格式，而是随着主体知识、道德的进步趋于精密与合理。下篇论超时空，认为超时空的境界是心与理一，神与道俱，与造物者游，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境界。也即与道体、性体、仁体为一的境界。本篇既论证时空的性质，也论证超时空的性质，且中西哲学夹辅，与一般发挥康德思想的文章不同。

《宋儒的思想方法》是贺麟讨论哲学方法最深入的一篇文章。文中指出，程朱的格物穷理，陆王的反求本心和致良知，其思想方法都是直觉法。他对直觉的看法是：“直觉是一种经验，复是一种方法。所谓直觉是一种经验，广义言之，生活的态度，精神的境界，神契的经验，灵感的启示，知识方面突然的、当下的顿悟或触机，均包括在内。所谓直觉是一种方法，意思是谓直觉是一种帮助我们认识真理、把握实在的功能或技术。”^①就是说，哲学本体论的方法就是直觉方法。这种方法是一种基于天才的艺术，运用这种艺术的精粗工拙，完全视学养训练之高下。贺麟并且认为，直觉与理智不是相悖的，而是互相补充的。他在其中区别出先理智的直觉与后理智的直觉。先理智的直觉是先用直觉方法洞见全体，然后用理智分析此全体。后理智的直觉是先用理智的方法从事局部的研究，然后用直觉的助力洞见全体。陆王学派可以说是先理智的直觉，程朱学派可以说是后理智的直觉。贺麟之所以用理智补充直觉，就是要把直觉从狂诞的简捷的反理性主义中救治过来，回复其正当的地位，发挥其应有的效能。这与怀特海将柏格森的直觉主义与詹姆士的激进的经验主义从反理智中救治过来所取路径一致。其调和理智主义与直觉主义，调和程朱陆王两派，给中国哲学之偏于直觉注入西方哲学的理智因素的用意是显而易见的。

《辩证法与辩证观》是贺麟的另一篇重要文章。这篇文章把他得于黑格尔的总念式思考，得于新黑格尔主义的着重从历史和生活实践中发现和提炼识度的方法，及得于中国哲学对天道性体的直观法结合为一，

^① 《哲学与哲学史论文集》，第179页。

论证了辩证法的本质和功用：“辩证法自身就是一个矛盾的统一。辩证法一方面是方法，是思想的方法，是把握实在的方法。辩证法一方面又不是方法，而是一种直观，对于人事的矛盾，宇宙的过程的一种看法或直观。”^① 贺麟分析了辩证法在西方哲学史上的不同含义及发展过程，指出古希腊的辩者的论辩术、苏格拉底的道德教训法、柏拉图的求形而上学知识的辩证法及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内在发展线索，最后归结为他用各种学术成分融合了、延伸了的黑格尔哲学：“总结起来，我们可以说，黑格尔的辩证法本身就是一个对立的统一，是形式与内容的统一；是天才的直观，谨严的系统的统一；是生活体验与逻辑法则的统一；是理性方法与经验方法的统一。”^② 这种方法其实也是贺麟自己治学的方针。

贺麟平生研究、传播西方哲学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对斯宾诺莎思想的译述。他翻译了斯宾诺莎的《知性改进论》（曾名《致知篇》）、《伦理学》两部重要著作，发表了《斯宾诺莎哲学的宗教方面》、《斯宾诺莎身心平行论的意义及其批评者》、《斯宾诺莎哲学简述》等文章。他认为，斯宾诺莎和康德是发展到黑格尔的两条线，要弄通黑格尔哲学，非先弄通斯宾诺莎哲学不可。他对斯宾诺莎，不仅详细介绍其高洁的、战斗的一生，而且重点论述斯宾诺莎的泛神论、真理标准论，尤其对斯宾诺莎“从永恒的范型下观认万物”的直观法称道不置，并认为它和中国传统文化中佛教的“以道眼观一切法”的慧观法、庄子“以道观之，物无贵贱”的道观法、朱熹“以天下之理观天下之事”的理观法可以类比。对斯宾诺莎以知识、理性征服自己的被动情感以得自由、得解脱的学说非常敬佩，认为与中国儒家所倡导的知天理、爱天理、行天理而得到自谦的学说是同一个道理。他还吸收斯宾诺莎的身心平行论来论证和改造关于知行合一的观点。

知行问题的发挥，是贺麟的哲学创造的又一个方面，这方面的重要著作是1938年发表的《知行合一新论》和1947年发表的《知行问题的讨论与发挥》两篇文章。《知行合一新论》吸收了斯宾诺莎、格林和行为心理学的观点，提出“自然的知行合一观”和“价值的知行合一观”的区别；在价值的知行合一观中又区分出“理想的价值的知行合

① 《哲学与哲学史论文集》第220页。

② 同上书，第234页。

一观”和“直觉的价值的知行合一观”。在知行二者的关系上，认为知是行的本质，行是知的表现；知是体，行是用；知永远决定行，行永远被知决定；知为主，行为从；知永远是目的，行永远是工具。并反驳心理学上的“副象论”（Epi—phenomenalism），詹姆士、兰格的情绪说和杜威的操作论所持的行主知从的知行合一论。贺麟之所以花大力气讨论知行问题，是为了使人们明了离知无行，离开学问无涵养，离开真理的指导无道德的道理，破斥缺乏道德的知识基础的武断的道德命令、道德判断。

在《知行问题的讨论与发挥》中，贺麟反复强调知行问题的迫切性与重要性，指出知行问题的讨论与发挥对于抗战建国的实际影响，并且明白宣示自己在知行问题上的观点：第一，知难行易说与知行合一说不但不冲突，而且互相发明。第二，从知难行易说推绎出来的“能知必能行”和“不知亦能行”两个原则，较之知难行易说本身更为重要，更有学理基础，更能指导现实生活，更能表现近代精神。第三，由知难行易说到知行合一说是一个逻辑发展。知难行易说应以知行合一说为基础，不然则理论不坚实；知难行易说应以知行合一说为归宿，不然则理论不透彻。这些看法是非常切实和富有哲学识度的。

（三）

贺麟生于中国社会急剧变化，中西文化激烈冲突的20世纪前半叶。他认为，中国近百年来的危机从根本上说即文化的危机，而要应对、克服这个危机，关键在于能否真正彻底地、原原本本地了解并把握西方文化。贺麟自少年起，就由父亲教读《朱子语类》，对宋明理学浸润很深。进入清华学校后，又在梁启超的影响下对阳明学甚感兴趣。留学美国之后，他对实用主义、纯粹经验论不能契合，而心仪于能综合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具有强烈的历史文化意识，具有对终极价值的不懈追求，又特别注重主体的创进意识的德国古典哲学，并以之为理论基础，融会中国的儒家哲学特别是宋明理学。他在30年代的中国文化论争中，写了《儒家思想的新开展》、《新道德的动向》、《五论观念的新检讨》、《宋儒的新评价》、《功利主义的新评价》、《自然与人生》等文章，鲜明揭橥新儒学。他提出：“儒家思想，就其为中国过去的传统思想而言，乃是自尧舜禹汤文武成康周公孔子以来最古最旧的思想；就其在现代及

今后的新发展而言，就其在变迁中、发展中、改造中以适应新的精神需要与文化环境的有机体而言，也可以说是最新的新思想。在儒家思想的新开展里，我们可以得到现代与古代的交融，最新与最旧的统一。”^①他指出，20世纪三四十年代，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时代。民族复兴不仅是争抗战的胜利，争中华民族在国际政治中的自由独立和平等，民族复兴本质上应该是民族文化的复兴；而民族文化的复兴，最根本的就是儒家文化的复兴。假如儒家思想没有新的开展、新的前途，则中华民族以及民族文化也不会有新的开展、新的前途。儒家思想的命运，是与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盛衰消长同一而不可分的。贺麟认为，西方文化的输入，是发展儒家思想的一大动力。儒家思想能够把握、吸收、融会、转化西方文化以发展自身，儒家思想就能发展，否则就会消歇、沉沦。他说：“儒家思想是否复兴的问题，亦即儒化西洋文化是否可能，以儒家思想为体、以西洋文化为用是否可能的问题。中国文化能否复兴的问题，亦即华化、中国化西洋文化是否可能，以民族精神为体、以西洋文化为用是否可能的问题。”^②在《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中，贺麟提出了“新儒家”一词，为以后“现代新儒家”、“当代新儒家”等提法奠定了基础。此外，儒化西洋文化、华化西洋文化，儒家思想为体、西洋思想为用等提法，在以后儒家思想研究中是讨论最多、不能回避的问题。

贺麟同意胡适的主张：传统道德的解除，非儒家思想的提倡，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要目标。贺麟又加上西方文化的输入与把握一点。此三点，贺麟认为是儒家思想的新开展所应取的途径。

关于解除传统道德的束缚，贺麟指出，道德变动的方向，是由孤立狭隘趋于广博深厚；由枯燥迂拘、违反人性，趋于发展人性、活泼有生趣；由因袭传统、束缚个性，趋于自由解放、发展个性；由洁身自好的消极的独善，趋于积极的社会化、平民化的共善。具体说来，就是“从学术知识中去求开明的道德，从艺术陶养中去求具体美化的道德，从经济富裕的物质建设中去求征服自然、利用厚生的道德，从法治中去为德治建立健全的组织和机构，从道德中去为法治培植人格的精神的基础，从宗教的精诚信仰去充实道德实践的勇气与力量，从道德的知人功

① 《文化与人生》，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4页。

② 同上书，第6页。

夫进而为宗教阶段的知天功夫，由道德的‘希贤’进而为宗教的‘希天’。”^① 以此求得道德与各个文化部门的互助共进。

关于非儒家思想的提倡，贺麟提出，用墨家的到民间去的方向补充儒家的到朝廷去的方向，用墨家的栖遑救世补充儒家的独善其身，用墨家的功利主义补充儒家的身心性命，用墨家的宗教精神补充儒家的理智精神。他还提出，道家不以生死介怀，不以荣辱得失丧其心，而以精神生活的高洁、生命意识的洋溢为追求目标这一点，可以补充儒家汲汲入世带来的弊病，使儒家跳出社会政治道德的狭隘圈子。山林的清新自然可以调节官场的争斗奔竞，诗人、艺术家的美学眼光可以调节俗世生活带来的心劳日拙，道家的返朴归真可以医治现代人、城市人的病态文明。对于法家，贺麟反对申韩式的严刑峻法，反对以人民为专制暴君的工具和奴隶，提倡德政教化与刑法相辅而行，赞扬治国以严、治民以爱的诸葛亮式的儒法结合的人物。对近代民主制的法治，他衷心向往，认为此种类型的法治的产生，是由于文化学术的提高，政治教育的普及，自由思想的发达，人民个性的伸展。他主张文化、武化、工商化互相影响、互相辅助、互相补充。

关于西方文化的输入与把握，贺麟认为，儒学主要是三个方面：诗教、礼教、理学，也即艺术、宗教、哲学。儒家思想的新开展，将循艺术化、宗教化、哲学化的道路前进。故须第一，以西方的哲学发挥儒家的理学。也就是以西方哲学的正宗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的哲学与中国的正宗哲学孔孟老庄、程朱陆王融会贯通，产生新的民族哲学。目标是使儒家哲学内容更丰富，体系更严整，条理更清楚。不仅为新道德，而且也为新科学奠定理论基础。第二，吸收基督教的精华以充实儒家的礼教。以宗教精诚信仰、坚贞不贰的精神，博爱慈悲、服务人类的精神，襟怀广大、超脱尘世的精神补充儒家的不足。第三，领会西方的艺术以发扬儒家的诗教。因为艺术是本体界的义蕴的表现，是精神生活的表现。新的儒学的兴起，应该是与新的艺术联合并进的。总起来说，新的儒家思想的建立与发展，必须循哲学化、艺术化、宗教化的方向努力。而所谓儒者，即既有学问技能又有道德修养的人。

贺麟以上关于复兴儒学的主张，他所提出的儒家思想的新开展所应

^① 《哲学与哲学史论文集》，第356页。

遵循的途径，是他被划入现代新儒家的最主要的依据。他提出的这些主张，代表了他那个时代自觉担荷民族复兴大业，真正融合了中西文化的学者对未来时代的擘画，是一个以继承和发扬儒家文化为己任的知识分子对时代做出的贡献。

联大八年，贺麟写了许多论文，指陈兴亡大计，讲论哲学各方面的问题，在当时产生了较大影响。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西南联大抗战使命完成，贺麟随北大复员回到北京。离开昆明前，贺麟将这些文章收集起来，汇为一编，名《文化与人生》，交商务印书馆出版。贺麟说，这本书中的每篇文字，都是因当时的文化问题、伦理问题、人生问题所引起。解答这些问题所取的途径，比较接近中国的儒家思想和西方康德、黑格尔所代表的理想主义。这本书的特点，一是有我，有自己对当时迫切的文化问题的思考。二是有渊源，即以儒家思想为主，吸收非儒家各派的优长之处。三是吸收西方思想。这些特点是贯穿全书的。

在联大时期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黑格尔理则学简述》的完成。贺麟留学归国后，一直讲授黑格尔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课程。1943年，在联大讲授“黑格尔的逻辑学”，《黑格尔理则学简述》是本课的讲稿。“逻辑学”译作“理则学”，是采用孙中山的译法。贺麟认为，理则学是黑格尔全系统的中坚，是黑格尔哲学之体，其他都是“应用逻辑学”，是体的表现。《理则学简述》的贡献在于，贺麟对黑格尔全系统的理解，不仅不同于当时国内的黑格尔研究者，也不同于国外的黑格尔专家。他认为，黑格尔的哲学系统，应该以《精神现象学》为全系统的导言，为第一环；以理则学（包括《大逻辑》、《小逻辑》）为全系统的中坚，为第二环；以广义的精神哲学（包括自然哲学，法哲学、道德哲学、政治哲学、历史哲学、艺术哲学、宗教哲学、哲学史）为全系统的发挥，为第三环。《精神现象学》的特点是活泼创新，代表黑格尔早年的自由创进精神。《逻辑学》的特点是精深谨严，代表他中期专门的、艰深的系统。精神哲学的长处是博大兼备，代表他晚年系统的全体大用，枝叶扶疏。这种分法特别突出《精神现象学》所表现的“绝对精神是个战将”的思想，是贺麟吸收新黑格尔主义的观点，突破正反合的“死范畴的摆布”，恢复整全的黑格尔、立体的黑格尔的鲜明体现。贺麟同时也很看重理则学的思维与存在统一、现象与本质统一、逻辑与历史统一诸理论。

贺麟在《黑格尔理则学简述》中另一个较大的发挥在“理性的机